

語言學論文選譯

第六輯

(結構主義問題討論專輯之一)

PC2)
3#6



中華書局

新青年论文选编

第一集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



商务印书馆

語言學論文選譯

第六輯

(結構主義問題討論專輯之一)

中華書局

內 容 提 要

這一輯語言學論文專門討論現代語言學重要流派之一的結構主義的理論問題。主要是從蘇聯《語言學問題》雜誌翻譯過來的。作為討論的開始，大部分文章都以介紹結構主義的內容實質為主要任務。關於結構主義內部的學派，各篇文章大都談到布拉格的功能語言學學派、哥本哈根的語言單位論學派和美國的描寫語言學學派和它們之間的區別。米庫什的論文着重介紹了他的句段學理論。列夫辛的論文初步介紹了語言學中的數學方法。阿赫馬諾娃的兩篇論文是在本書第一篇社論發表前寫的批判性文章，其中也有介紹的成分，可以結合起來研究。

語言學論文選譯（第六輯）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5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耗 1/32·4 1/2 印張·119,000 字

1958 年 4 月第 1 版

1958 年 4 月上報第 1 次印刷

印數：1—2,300 定價：（9）0.65 元

統一書號：9018.38 58.3, Ⅱ型

目 录

当前苏联語言学界几項迫切的任务……苏联《語言学問題》社論……	1
論結構主义語言学的本質…… S. K. 邵勉……	16
結構主义問題的討論与句段学原理…… F. 米庫什……	38
关于結構主义的几点意見…… M. I. 斯鉄布林-卡勉斯基……	50
結構主义語言学、意义学和詞的研究的問題…… I. I. 列夫辛……	59
关于結構主义問題的討論…… B. 特倫卡等……	74
关于結構主义討論的几句话…… Z. 史切毕尔……	86
語言学的結構主义的基本派別…… O. S. 阿赫馬諾娃……	89
論語言学范疇的“同形”概念…… O. S. 阿赫馬諾娃……	119
結構主义……苏联《大百科全書》……	139

当前苏联語言学界几項迫切的任务

苏联《語言学問題》社論

- (1) 苏联語言学界当前存在的缺点
- (2) 开展結構主义学說的討論
- (3) 斯拉夫学的几項任务

(I) 苏联語言学界当前存在的缺点

苏联共产党第 20 次代表大会向苏联全体科学家提出了重要而光荣的任务。第 20 次党代表大会对各門社会科学的工作提出了尖銳的、具有高度原則性的批評，对語言学來說，这些批評在很多方面也是很中肯的，它要求我們坚决地克服語言学主要問題的研究工作中所存在的严重缺点，并且彻底地改进語言学研究机构及《語言学問題》杂志的工作。

从馬尔院士的理論开始占統治地位起，多年以来，在我国語言学界中，庸俗唯物主义的观念占了上风。这种庸俗唯物主义的观念，既沒有依据具体的材料，沒有深入地研究发展中的語言諸現象，又沒有历史地分析語言現象及其发展規律。通常总是先准备好現成的架子，然后嵌入些語言現象，并且往往只提那些很容易嵌进去，不会发生矛盾的現象。1950 年的語言学討論引导苏联語言学走上了新的，基本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即使在討論以后，許多方面依然沒有充分自由而广泛地开展具体地历史地研究語言的工作及其理論上的概括工作。代之而起的是对斯大林所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的一切原理的教条主义式的崇拜，把这些原理看作不可动搖的真理。譬如說，近几年来，在研究語言和社会的联系問題时，忽略了不同社会

* 小标题是譯文編者加的。

阶层所运用的言語之間的區別。不仅在教材中，甚至在專門性的論文中，都沒有研究語言与社会其他現象之間的关系这一复杂問題，而只是簡單地重复或者解釋斯大林所提出的區別語言与上层建筑的几个特征。很多研究普通語言学中其他重要問題（如語言的融合、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語言与思維的关系、普通語义学、部族語和民族語的发展、不同时代全民口語的方言差异、个别詞或詞群的詞义中阶级意識形态的消失等等問題）的著作中的共同特点就是沒有对多种多样的材料进行生动的、全面的、具体的历史分析，过多地引証了斯大林的著作而沒有一点批判态度。談到語言的起源問題时，也处处都是帶引号或不帶引号的引証。有关这个問題的著作沒有很好地利用考古学、人种学和生理学所获得的新材料。

近几年来，与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及基本詞汇問題有关的各种問題成了許多語言学家的注意中心。这些問題过去在科学著作中就已經提出过。还在斯大林所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問世以前，就有些語言学家采用过“基本詞汇”“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等术语^①。但是，我們最近几年的語言学著作中，关于这些問題的討論也往往流于抽象的、理論上的空談。

当然，如果只因为这些問題有时候引起过某些沒有結果的爭論，于是便否認这一切問題的重要性而不去研究它們，那是不正确的。但是也不應該設想，只要批評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的某些論点（例如他沒有根据地確認俄罗斯民族語言的方言基础是庫爾斯克-奧勒尔方言；从历史观点看来，他不正确地闡述了法語在中世紀英国的作用等），就可以导致語言学中的真正有成效的科学工作。應該改变的是語言研究的工作的作风，將語言研究引上一条新的大道，这就是大胆地、創造性地研究那些細致地收集到的和新发现的語言史方面的事实，并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論的基础

^① 譬如說，可以比較 J. Vendryes 关于“引起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的作用”的說明（見他所作《語言》，莫斯科 1937 年版，第 220 頁）。就是馬爾也提到过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見他的选集第 2 卷，1936 年，第 117 頁）。还應該記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出并討論过某些社会現象发展的內部規律問題。

上进行理論上的概括。个人崇拜往往限制了，而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压制了、窒息了普通語言学方面的独立的理論研究工作。斯大林所說过的每一个論点都变成了不可动摇的教条，甚至不需要作任何解釋并具体地从历史上加以論証。

有人認為，我們似乎已經有了現成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基本原理大全，我們的語言学家只要运用这些原理就可以了。很明显，这种看法是十分錯誤的。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有关語言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指示，但是数量很少，因此必須仔細地研究这些指示。譬如，大家知道，馬尔院士及其追隨者漠視恩格斯在其致布洛赫的信中所說过的不可能用經濟原因去解釋語言方面的变化的观点^①，結果給苏維埃語言学帶來了很大的害处。馬尔的追隨者把語言学中的历史比較法叫做資產階級的方法，完全不理會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比較語言学所給予的崇高的評價。在《真理报》所开展的語言学討論中，参加討論的人批判了馬尔的錯誤观点，从而为发展历史比較語言学創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尽管近六年来发表了許多有关历史比較法的論文，我們却几乎沒有見到过深入的、具体的历史比較研究，而这种研究正是目前苏联語言学界所特別需要的。此外，还應該特別指出，历史比較法的运用范围太狹窄，應該进一步改进这个方法。要想描写一定发展阶段的語言（因此，也是为了編写現代諸語言的描写語法），要想研究有書面文献以后語言的历史，还必须借助于語言学的其他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至今还没有澈底研究过；苏联語言学界及《語言学問題》雜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探討这些方法，并且发展一些运用最新的历史比較法、历史法和描写法等語言研究方法的具体文章。这些文章必須含有丰富的具体材料，并且是根据最先进的，吸取了过去全部优点的語言研究方法写成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进行概括，从而將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为基础的苏維埃普通語言学推向前进。

要想有效地研究語言科学中的一切悬而未决的爭論問題，必須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俄文版，第2卷1943年，第467—468頁。

开展大胆的创造性的爭論，讓苏联語言学界不同的学派和派別的代表們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見。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應該成为苏联每一个語言学家的語言理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說，苏联所有語言学家对一切具体的語言学問題應該抱同样的見解。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爭論和討論能够推动而且應該推动我們的科学向前发展。《語言学問題》杂志有責任在組織这些自由討論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

苏联共产党第 20 次代表大会的決議要求苏联学者必須掌握祖国和外国科学的一切成就。苏联語言学家應該利用革命前俄国和今天苏联語言科学的全部宝貴經驗和国外語言学中一切进步的和有益的部分。同时，苏联学者也應該坚决地批判那些立足于敌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原理之上的語言学理論。但是，在批判地分析外国語言学方面的唯心主义理論时，必須有經過严格审查的事实作根据。應該分別地对待語言学方面的專門成就和对語言学中的新发现底錯誤的、唯心主义的解釋，因为这些成就苏联語言学家也可以加以利用。

近几年来我們出版界所发表的文章表明，我們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往往走上了一条錯誤的道路。譬如美国出色的語言学家謝皮尔 (E. Sapir) 被毫无根据地責难为种族主义的宣傳者。其实，大家都知道，謝皮尔对美国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歧視的各种表現进行过頑强的斗争。謝皮尔是北美印第安人的語言和风俗的卓越的研究者和鉴赏家，他比美国其他学者更为尊重他們的文化。謝皮尔多次反对將种族与語言混为一談。我們倒是應該比較仔細地研究他的著作，而不是不分青紅皂白，責备謝皮尔的种族主义。順便还要指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尖銳地批評过美国某些集团所特有的对待科学的态度^①。只有这样，才可以給予这位科学家的語言学著作以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这些著作中既有一些錯誤的唯

^① 見《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Berkeley — Los Angeles 1951 年（謝皮尔論語言、文化與人格的論文選集）。

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又有語言学方面的許多有价值的总结和概括,因为作者曾細致地分析过不同語系中許多語言的現象。

在评价其他一些外国語言学家的活动时,也有过同类性質的錯誤。但是要知道,有許多重要的問題,不利用外国的科学經驗,是不可能解决的。

苏联共产党第 20 次代表大会关于第六个五年計劃的指示中特別注意扩大电子計算机的生产。翻譯机器是这种电子仪器中有重大实用价值的一种仪器。美国制造翻譯机器的規模十分龐大,1954 年起,并出版了关于翻譯机器問題的杂志。英国和意大利也在进行这项工作。尽快地制造电子翻譯机器也是我們的任务。为此我們必須解决一系列的純粹是語言学範圍內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將翻譯机器所翻譯的語言的語法变成一套規則,并且用一定的电碼来表示这些規則。因此,必須积极地、批判地学习現代結構語言学和数理邏輯的各种方法。語言的結構分析的某些方法帮助了电子翻譯机器的制造和运用,但是,我們还不能因此直接作出結論,認為結構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合理而又有根据的。翻譯机器的工作必須依靠語言学家、数学家和信息論、电子学方面的專家共同进行。不久以前又有人提出了制造口头翻譯机器的想法^①,要想实现这项任务,必須大力加强音位学和实验語音学的研究工作,因为目前在我国,实验語音学还是一門落后的語言学科。

制造翻譯机器的任务和語言統計学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門比較年輕的語言学科在国外发展得很迅速[参看可恩(M. Cohen),吉罗和捷克語言学家特倫卡(B. Trnka)等人的著作]。但是近几年来苏联却根本沒有研究語言統計学。

目前,語言学日益接近精密科学(首先是数学),其原因之一就是語言学家力图研究出一套尽可能精确的研究語言的方法。

^① 例如,参看 W. N. Locke 作《Speech typewriters and translating machines》(口头打字机和翻譯机器),《美国近代語言协会会刊》,第 LXX 卷,第 2 期,1955 年。

(II) 开展結構主义學說的討論

《語言學問題》編輯部准备在最近几期杂志上展开結構主义問題的討論。結構主义在国外語言学界流傳甚广，但是在苏联科学界至今还没有得到全面而客觀的闡釋，而且几乎没有反映在我国語言学研究的方法、技术和術語等方面。为了使这个討論获得最好的效果，必須尽一切努力，使这个討論帶有具体的語言学的性質。因此，我們希望，在討論过程中論証某个原理时，必須用具体的語言学著作作为例子，并且用具体的語言材料去說明那被籠統地称为“語言学的結構主义”的多种方法和原則的优缺点。（也許我們並沒有充分的根据安上这样一个籠統的名称。）

在討論“結構語言學”的方法时，和討論語言学的結構主义實質問題时一样，往往只引用語音材料，而形态音位学（морфонология）和形态学的現象談的很少。在比較欧洲結構主义者和美国描写語言学家的研究方法时也只是根据他們对音位系統的解釋并因而認為这两种方法类似。其实，語言的音素即使从音位学的角度分析，也还是具有一定的特点：它沒有固定的为詞素所特有的意义，因此与詞素、詞和詞組有本質的差別。由此可以看出，把音位主要地甚至是唯一地看作某种对比关系的因素，这种观点虽然确实有很大的成效，但是，这一点實質上却无助于解决另一个更广泛、更一般的問題，即結構主义的方法在描写整个語言、研究語言的詞汇和語法体系方面究竟有什么效果的問題。

《語言學問題》杂志在发表庫里洛維奇（J. R. Kurylowicz）的《略論詞的意义》（1955年第三期）一文时，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把在音位学中之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用来研究語言的詞汇系統的問題。这篇論文將已故的卡尔采夫斯基（S. Karcevskij）的有名著作《論語言符号的非对称的二元論》（Du dualisme asymétrique du signe linguistique,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1, 1929）的論点用之于詞汇，并有所發揮。这篇文章之所以特別引人注意，是

因为实际上它最先试图从“結構語言学”的角度去闡明詞汇学的各种問題，將結構主义方法运用到詞汇研究方面。（大家知道，自索緒尔所著《普通語言学教程》以来，結構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不区分語法学和詞汇学。）

庫里洛維奇的論文不仅对詞汇学理論有上述意义，它还有更普遍的方法論上的价值。其中有两个問題特別重要。（1）如果在語音学方面，各个不同的結構主义学派之間現在已經几乎没有什么原則分歧，那么，在詞汇学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認為它們之間已經十分接近呢？因为，庫里洛維奇所提出的詞汇研究系統还是立足于表現主义（экспрессионизм），从語言符号的两面性出发，將意义也看作是語言符号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而美国的描写語言学中意义問題根本不屬於語言研究的范围。（2）現在对許多語言的音位系統已經有了各种各样的結構上的描写，但是，运用在詞汇学上时，这个任务还只是处于提出問題的阶段。因此特別需要用具体材料去檢驗結構主义所提出的各种方法的效果和可靠程度，并揭示出詞汇学研究中結構主义諸原則本身及其方法論上所具有的特点。

在句法中，結構主义方法的运用問題尤其复杂。大家知道，現代語言学界，不論什么派別，都有一个共同的趨勢，即希望制訂出一些不同于19世紀語言学所采用过的新的方法，以研究語言的句法現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方法的注意中心恰好也是結構分析的形式方法，这种方法摆脱了“邏輯主义”和“心理学主义”^①的影响。（对某些研究者而言，邏輯主义和心理学主义乃是精神主义[ментализм]的表現，而精神主义和实証主义在原則上是針鋒相对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形式”和“功能”的問題，形态学、句法、詞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关系問題也要重新估价了。

目前，“句子成分”这一概念有許多流引最广的“化名”，“直接組

^① “邏輯主义”是指研究語言的句法現象时将語言与邏輯混淆，如將句子与判断、主語与主詞、謂語与謂詞混淆等。“心理学主义”是指研究語言的句法現象时将語言与心理过程或現象混为一談，如沙赫馬托夫在談到句子的本質时，就表現了明显的心理学主义色彩。

成者”这个概念也許就是其中的一个。某些学者認為,这个概念也就是索緒尔派所理解的句段(синтагма),只是換一个名称罢了。如果这个看法正确的話,那么我們就不能不感到惊奇,在划分結構主义的一般派別和多次討論“結構語言学”的一般問題时,近几年来为什么沒有考虑到日内瓦学派的著作以及某些既不属于布隆菲尔德学派和叶尔姆斯列夫語言学学派(глоссематика),也不是特魯別茨可伊的学生的著名語言学家底著作。因为如果把“直接組成者”或句段看作現代結構主义句法(或結構句法)的基本范疇,下面三篇論文就会引起极大的兴趣。

(1) 米庫什(F. Mikuš)著《句段是双成分的嗎?》(Le Syntagme est-il binaire?),載于《Word》杂志第3卷第1、2期,1947年。

(2) 福雷(H. Frei)写了一篇文章,反对上述論文,題目是《关于句段的分析》(Note sur l'analyse des syntagmes),載于《Word》第4卷,第2期,1948年。

(3) 后来,米庫什又写了一篇很長的論文答复福雷,題目是《語言的結構型到底是什么?》(Quelle est en fin de compte la structure-type du langage?),載于《Lingua》杂志,1953年,第3卷4期^①。大家知道,这个問題的討論現在还在繼續进行。自然,就发生了一个問題:要想研究句法学中的結構方法,也許,主要的不是去參考叶尔姆斯列夫語言学的体系和美国描写語言学的著作,而是去參考索緒尔的追隨者的著作,因为他們之中有些人所走的道路是最深入地研究“語言”和“言語”的辯証关系,將語言看作某种“潜在物”,而將“言語”看作这种潜在物在现实中的体现。正如上面所談到的,在討論現代語言学的結構主义問題时,都几乎沒有涉及到上述这些問題,而句法問題(詞汇学問題也是这样)事实上連考虑都沒有考虑进去。

我們提出上面这些問題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注意語言学結構主义一般問題中某些至今仍多少遭到輕視的方面。当然,提出某些問題

^① 并請參考 R. F. 米庫什的專論:《关于貝利奇教授的句段学》(A propos de la syntagmatique du professeur A. Belić), Ljubljana, 1952.

作为科学界当前最本质、最值得注意的问题，絕不意味着討論將因而只能在这些问题的范围内进行。音位学，特别是历史音位学的问题不可能不吸引大家的注意。“語言符号論”和“語言学符号的本质”问题也很可能在討論过程中提出来，因为虽然这个问题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絕不能认为已經获得解决。語言是一个体系的說法也还没有成为公理，因为还没有一种語言呈現为某种体系。在談到語言的体系时，泛論者居多，誰也沒有提供一个真实而全面地描写語言体系的范例。（通常仅限于部份地确定音位和語法方面的体系关系，在詞汇方面則只有个别的极小的草案。）因此，有人怀疑“語言是体系”这个原理，是完全有根据的。此外，下面專門提出来的问题中，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語言的历史和人民的历史之間的联系問題。然而，这个问题將必然会討論到，因为目前对这个问题感到极大兴趣的不仅有語言学各派別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有跟語言学有关的各学科(包括人种学)的代表人物。

作过了上面这些簡短的預先的說明以后，我們特地大致地列举出以下九个問題，編輯部認為，討論这九个問題可能是比較适当的。

1. 是否可以采用語言結構主义的下述定义：語言結構主义是語言学中的一种派別，它認為語言学主要的、独立的研究对象是語言体系中各部分之間的关系，而且这些部分只能看作是对应关系中的因素。是不是可以說，語言結構主义認為，关系是第一性的，而語言中处于对应关系中的(即现实中存在的)各个單位本身却是第二性的，是从属的。

如果对語言結構主义的上述理解是正确的話，那么“語言結構主义”这个概念中應該包括一些别的什么內容？

2. 目前大家將現代語言学的三个派別，即布隆菲尔德学派、特魯別茨可伊学派和叶尔姆斯列夫語言学的追隨者所屬的学派統称为語言結構主义，这个称呼是否正确？取消(或否認)这三个学派之間原則方面的差別，單凭經驗就將它們所采用的描写語言的具体方法混为一談，这种傾向是否正确？“結構語言学”的不同学派和派別的主要

分歧究竟在那里？應該如何評價結構主義的某些學派和代表人物的活動和成就？結構主義的某些派別和某些學者是怎樣從理論上（從哲學、心理學和邏輯學各方面）認識結構主義的各項原理的？

3. 語言結構主義在語言史中究竟占什麼地位？它的起源是什麼？是不是可以認為，現代語言結構主義的方法和頗尼尼所採用過的描寫語言的方法有關聯？究竟誰可以看作是現代結構主義者的開山鼻祖？“結構語言學”的發展前途將是怎樣？

4. “結構語言學”的方法是否可用於語言的各个方面——語音、語法和詞匯？是不是可以認為，結構主義各學派所採用的對語言的描寫分析方法可以保證合理地解決或接近解決描寫語言的任務？在具體語言的語音學、語法學和詞匯學方面，運用語言結構主義的方法写出了哪些著作？從這些著作所得出的具體論證和結果來看，應該怎樣評價這些著作？

5. 根據同形關係（изоморфизм）的原則描寫語言的各个方面是否可能，是否正確？是不是可以指出成功地運用這個原則描寫語言體系的具体例子？

6. 現在有人運用結構原則構擬未被文獻、現代語言和語言的直接對應關係所証實的語言現象，應該怎樣看待這種作法？（討論這個問題時，最好利用自己用歷史比較法研究語言的經驗，即指出用歷史比較法研究某一個語族的語言時，什麼時候採用結構的構擬方法行之有效？）

7. “結構語言學”的方法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用來研究語言的歷史？某些結構主義者對歷史比較語言學和歷史主義原則抱否定或懷疑態度，這種原則性的見解是否可以採納？“結構語言學”對研究語言的類型學有什麼意義？

8. 國外現代語言學各派別中結構主義占據什麼地位？

9. “結構語言學”和運用數學研究方法之間有多大程度上的聯繫？

當然，在廣泛地开展關於語言結構主義的討論時，還會發生一系

列的其他重要問題，討論这些問題，將无疑地会有助于更好地研究語言学的某些方面并确定苏維埃語言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共同道路。

(III) 斯拉夫学的几項任务

除开討論語言学的結構主义以外，《語言学問題》雜誌編輯部最近的另一項任务就是刊登某些論文、报导、短評和評論，全面地討論語言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和个别語族內的各种现实的問題。由于目前正在准备將于195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斯拉夫学者国际代表大会，所以，很明显，我們首先應該集中我国斯拉夫語專家的力量，解决斯拉夫語言学中的主要的、最重要的問題。根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決議，已經成立了苏联斯拉夫学委员会（主席是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它的任务是組織苏联斯拉夫学者，准备斯拉夫学者国际代表大会，帮助斯拉夫学者国际委员会組織莫斯科代表大会，确定會議將要討論的問題并采取一系列学术上和技术性的措施，以便改进科学情报工作，加强斯拉夫学的国际联系，編写参考書目录。

苏联斯拉夫学委员会提出了現代斯拉夫語言学各方面的一些迫切問題。在斯拉夫語言学家国际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和开会期間如果能广泛地討論这些問題，如果参与討論的不仅有苏联的語言学家，而且还有其他国家的斯拉夫語言学家，那將不仅十分有益于斯拉夫語言学，而且能創造一种气氛，使各国之間广泛地进行創作方面的科学交流。因为大家还记得，在組織1939年貝尔格萊德国际斯拉夫学者代表會議时（这次會議因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召开），也提出了許多重大的科学問題，提交各国科学家会前討論^①。1955年9月15日召开斯拉夫学者貝尔格萊德會議时，塞爾維亞科学院院長貝利奇在其开幕詞中也曾提到这一点：“1939年代表會議曾提出一系列的科學問題，供專家們研究，以便这些問題能順着正确的

^① 見《1939年9月18至25日第三屆斯拉夫学者（斯拉夫語文學家）国际代表大会》[III меѓународни конгрес слависта (словенских филолога) 18—25 IX 1939], 貝尔格萊德, изд. извршног одбора, 1939: № 1. «збирка одговора на питања»; № 3—«одговори на питања…… допуне»。

道路发展”^①。在召开国际代表大会以前，广泛地討論某門科学的最重要的問題，这种方法是完全行之有效的。

在語言学方面与莫斯科国际斯拉夫学者代表大会有关的問題和任务有下面四点：(1)各斯拉夫标准語的形成与发展問題；(2)各斯拉夫語历史比較語法学和历史比較詞汇学的主要問題；(3)各斯拉夫語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和历史比較方言学的中心任务。語言地理学的中心任务和編制各斯拉夫語方言地图的問題；(4)討論有关各斯拉夫語言和民族起源問題的新的材料。这些大的問題和任务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并且分为若干小問題。

下面我們就列举出一些較具体的語言科学問題，供代表大会前及会上討論。

語言研究的方法論方面

1. 各斯拉夫語言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比較研究中，結構語言学带来了哪些新的东西？
2. 所謂“內部構拟法”为研究原始斯拉夫語提供了哪些新的可能性？
3. 構拟前文字时期語言的句法現象时，是不是可以采用历史比較法？

各斯拉夫語的历史比較語音学方面

1. 原始斯拉夫語(或称共同斯拉夫基础語)的历史中，在哪些情況下应考虑到語音替代(субституция)的現象？
2. 原始斯拉夫語历史后期，开音节規則是不是在一切場合和一切語音位置上都起作用？什么时候这个規則停止了它的作用？
3. 共同斯拉夫基础語音位系統的发展規律問題。

^① 見貝爾格萊德刊印的貝利奇院士發音的塞爾維亞文稿：(А. И. Белич: 1955 年 9 月 15 日斯拉夫學者貝爾格萊德會議開幕詞 (Отваранье Скупа слависта у Београду 15 септембра 1955 године),